

谈国际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

王林海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 国际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法有着历史的和哲学的基础。功能主义法、解释说明法和批判研究法各有其优缺点。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辩证法出现于近些年,它是对上述三种传统研究方法批判性的综合。该方法包容并取,用动态、相关、相对、历史和全面的观点对待和研究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容许相互对立思想的并存,较适合国内外的现实需要和挑战。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教育中,学习辩证研究法是很有价值的。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 研究方法; 辩证研究法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6)06-0055-05

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起源

不同文化间的交际指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中国有人也称之为跨文化交际。国际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法有着历史的和哲学的基础,其源头可追溯到后二战时期的美国。当时正成为世界舞台上支配力量的美国开始向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派驻各种工作人员,然而受过良好外语训练的美国政府官员和商人们常常发现自己在国外应付另一种文化中的人和事并非得心应手。为此,美国政府特意成立专门机构研究不同文化间的交流问题,雇用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等对其海外工作人员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训。这些机构和人员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对国际文化间交际的许多研究方法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对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来自

学者们的研究哲学 (research Philosophies), 或称世界观 (worldview)。人们往往会戴着具有某一或某些特定文化色彩的镜片去看世界,从不同角度观察其所处的环境,选择、评判、组织并解释关于不同文化环境中人们的言行举止的信息。这些与不同民族和多元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研究哲学一定程度上促生了人们研究与学习异文化或跨文化交际的不同方法流派。

二、百家争鸣的研究局面

国际文化交际研究的历史虽不算古久,但研究方法业已呈现多样化态势,各种流派纷纷出现,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手段,围绕或侧重不同的内容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其中较具体易行的方法有:文化关键性差异主义 (the cultural critics), 文化相似主义 (the cultural similarities), 文化对话主义 (the cultural dialogist approach), 动态过程法 (the dynamic

Process approach), 内视法 (the 'emic' approach), 外察法 (the 'etic' approach); 经验学习法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approach) 等等。文化差异主义和文化相似主义是有关异文化交际探索和异文化交际教育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前者认为不同文化中差异性的东西才是导致交际出现交际偏差的潜在障碍, 所以受教育者要学习和了解这些障碍, 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 后者强调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之间有着许多共性, 恰恰是这些共同的东西帮助人们跨越了民族、种群和个体文化的界限。文化对话主义主张提高自我文化意识以及跨文化意识, 克服文化差异, 进行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世界交流。内视法偏爱从一种文化内部如其内部成员一样来理解其文化。相比之下, 外察法研究人员往往立身圈外, 旁观、对比研究不同的文化。动态过程法的提倡者视文化与交流为动态的永远变化的多层面的复杂体。经验学习法鼓励直接体验不同的文化, 去感受其人, 领略其道。经验学习法理念基于 Kolb and Fry 的经验学习循环模式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Kolb and Fry 认为异文化的研究与学习含四步要素: 1. 始于具体经验; 2. 去观察反思; 3. 形成概括性概念; 4. 在新环境中检验新概念。Kolb 说如果能让这一循环有效, 研究或学习活动在学习人员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都应是积极的。以上这些文化交际研究方法可以说简单易用、各有千秋, 是值得指导跨文化交际的教育和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工作者所借鉴的。

尽管较具体地说有关跨文化交际研究与教育的方法有许多, 但每种方法均存在局限性, 缺乏整体性和完整性, 所以很少有人单独使用一种方法研究国际文化交际, 而是综合归纳形成主要体系来指导这方面的教育和研究工作。传统上人们将这些方法体系综合分为三大类: 功能主义法 (functionalist approach)、解释说明法 (the interpretive approach) 和批判研究法 (the critical approach)。这三大类方法反过来对各种新的和老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法的形成和发展又产生重大的影响。

功能主义研究法也被一些人称作社会科学研究

法 (the social science approach), 主要基于人们对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 流行于 20 世纪 80 年代。按功能主义研究理念, 文化人的行为有可预测性, 文化是一种可测的变量, 文化对交流与交际的影响与人的特点对人们交往影响方式大同小异。所以该方法对异文化交际的研究目标就是通过了解不同文化中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情况具体预测文化的差异如何在跨文化交际中引起误解, 判断误解在哪个有可能出现, 从而指导人们在将来的交往中如何缩小理解偏差。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常常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通过分发问卷或观察研究对象等获得第一手材料。此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指导下的许多研究工作在辨识不同文化交际时的差异和变数以及在确定交际过程中人们心理和社会上的变量方面都被证明是较有成效的。然而功能主义研究法的局限性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逐渐开始被学者们指出: 人在交际方面的创造性以及人内在的复杂性远非易预测的, 许多定量研究手段难以深入问题, 缺少文化敏感性。

解释说明法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受到交际研究学者青睐。其研究目标是描述和解释某一特定时空环境内的行为而不是预测行为。其研究方法为定性研究, 采取实地研究 (field studies)、观察和参与式观察等技术手段。跨文化心理家常使用外察 ('etic') 和内视 ('emic') 区别功能主义研究法和解释说明研究法。功能主义者常以旁观者的眼光客观地搜集概括普遍性的东西, 因而是外部的 ('etic') 和普遍的 (general); 解释说明研究者强调在某一文化区域内客观地理解现象, 相对而言是内部的 ('emic') 和具体的 (specific)。批判研究法含有许多解释说明研究法理念: 强调主观性, 重视物质现实和具体文化背景的重要性。然而批判主义者强调的是文化的宏观背景环境, 诸如政治和社会结构对不同文化交际的影响。从批判研究角度来看, 文化是一种斗争的环境, 在此多种解释汇于一处, 研究人员的目的不仅是理解行为而且要用多种解释中处于斗争上风的思想或看法去改变交际人群的生活习惯与世界观。

三、跨文化交际研究辩证法

虽然功能主义研究法、解释说明法和批判研究法各有其优点,但功能主义研究法只侧重文化的差异性,其成果仅限于个人——集体主义分析和各种交际包容主义理论;解释说明研究法只注重较具体的某一文化内部的研究而忽视了世界文化的广义性和客观性;批判研究法又只是单一地偏重宏观政治、经济等态势。这三种方法相互有所联系,但有时又相互冲突。所以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有必要寻找更全面的综合方法。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辩证法出现于近些年,它是对上述三种传统研究方法批判性的综合。

首先,辩证法以变化的眼光动态地看世界文化或者某一国家的文化。这有助于避免偏见和误解。例如在西方学习文化的学生经常会被教师建议看一部名为《福乐门》(The Joy Lucky Club)的描写在美华人生活的故事影片。西方文化教师通常对这部电影评价较高,认为看这部电影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人许多典型的文化习惯和交际行为。然而看完这部电影后,中国学生多会发现影片中关于中国人的交往习惯、为人处世、女人地位、母女关系以及餐桌礼仪等的许多描述早已时过境迁,一些描写还容易导致误解和偏见。其次,辩证法相对地和历史地看待问题。这对正确理解不同文化中人们的行为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西方人眼中的某些“恐怖行为”在有些文化中可能会被普遍视作“自由斗争”。

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辩证法的最大一个优点在于它容许相互对立思想的并存。辩证法研究人员归纳了六个辩证对立统一体:文化与个体;个人与环境;差异性与相似性;静与动;过去、现在与将来以及优势与劣势的辩证统一。其中主张跨文化研究侧重文化间差异性的学说和主张重点研究文化间共同点的看法是跨文化研究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对立思想。关于文化差异性与文化相似性孰重孰轻的争论由来已久。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文化间的差异和相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之中,将差异凌驾于相似之上或将相似凌驾于差异之上都是极端的看法。

强调文化相似性的观点建立在二战后普遍流行的“国际间相互理解”的理念基础之上,其代表模式为前文提到的文化相似主义(the cultural similarities)。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种观点开始被强调将文化差异作为国际文化教育资源的必要性的文化差异模型所取代。强调不同文化交际的研究应主要研究关键性差异的文化差异主义(the cultural critics)是文化差异模型的发展代表。新出现的辩证方法是对上述两种模型的平衡。

历史上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表明文化相似使得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有可能相互理解和进行交流,文化差异则有可能导致不同文化间的人们在交往时出现问题,因此,平衡对待文化差异性和文化相似性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与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了解文化差异可避免误解,并有助于国际文化交流,然而,过分强调差异或忽略相似可导致教条和偏见。

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的表现往往是多方面的,不仅表现在思维方式和语言应用上,而且会流露于许多非语言行为中。香港著名学者刘必庆说过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多为螺旋式的,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多为流线型的。这在中西文化交往中确有体现。中国学生回答问题好拐弯抹角或旁征博引,西方人喜爱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因此中国学生刚到西方学习时可能会被认为不会回答问题。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直接否定别人的看法或经常反对别人的意见是不礼貌的。这种意识反映到讨论问题和篇章写作中往往会被西方学者误认为缺乏评判性思维。然而中西方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又常常会想到一起,容易沟通,我们的许多想法和处事方式他们也很欣赏。不同文化人的这些共性的东西显示出相似性研究在跨文化交际学中的一定意义和价值。在非语言行为研究方面,重视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也同样富有意义。对非语言行为中身体语言的研究表明东西方对某些眼部活动特征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长时间直视谈话对方的眼睛通常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当某位男学生在课堂上制造很大的噪音时,老

师通常会通过持续的直接眼光接触制止他。如果某位男生或男老师连续一段时间直视某位女生的眼睛,这位女生会感到不舒服而将自己的目光移开。女生长时间直视男生的眼睛通常会被认为有些轻浮。有意识地观察这些相同的规则无疑对正常交际和避免不愉快是有帮助的。此外,在非语言行为中研究差异规则也很重要。了解不同文化人对目光接触频率、触摸以及私人距离等的不同期待和意义也同样必要。“凝视他人时间的长短因文化而定”。因此,当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谈时,缺乏对彼此文化中人们目光交流频度和时间长短的了解也有可能就会导致误解。中国学生在西方学习时也常常因不懂或不重视与他人眼睛的交流而受到误解,被人认为不很诚实、可能在撒谎、胆怯或不感兴趣。缺乏对另一文化社交距离和空间感的了解同样也会产生问题或给自身带来麻烦。朋友曾在国内某一火车站目睹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来自西方的女士在售票大厅等候买票。由于她站在离售票窗口一米远的地方,因而长时间被售票员忽略。她疑惑地看着别人一个接一个径直走到窗口在她之前买车票。在中国,人们排队购物时通常彼此站得很近。离售票窗口很远站立可能被误解为“不想现在买票或正在等人”。而在西方,站得太近则会被认为是不尊重他人的隐私。东西方异性之间的距离观念也是大相径庭。在中国,同性好朋友之间私人距离较近,可能会容忍很近的身体接触,但近距离的身体接触对异性之间来说通常是不合适的,除非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达到谈婚论嫁的程度。相比之下,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男女朋友亲密接触是正常的,同性间的亲密接触却可能会被怀疑是同性恋。

辩证法包容并取,本着动态、相关、相对和历史的的态度看待不同文化间的交际,容许相互对立的思想的同时并存,因此同许多其它研究文化交际的方法比较起来,它是较有全面性的、较科学的、更贴近实际的研究和培训国际文化交际的方法。

四、学习跨文化研究方法的意义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新兴领

域,在美国也只有五、六十年的出现、形成和发展历史。最近几十年它才逐渐在前苏联、英国、澳洲等地形成规模体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国,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较早地对其开展了研究(如早期从美国留学归国的顾嘉祖教授);多数人的研究起步较晚,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教育方法方面未能与国际研究接轨。中国有句古话:“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完全可以与西方学者开展国际文化交际研究方面的跨文化交流,认真学习、充分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把各具特色的西式文化差异主义、文化相似主义、文化对话主义、功能主义、解释说明法、批判主义及辩证研究法等等引入国门,在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学术领域营造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批判性思维”、反对个人主义、偏爱中庸之路等原因,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把各种研究理念引入跨文化交际研究与教育领域并加以推广或许还存在许多现实和潜在的局限性。但是国际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辩证法强调求同存异、对立统一和变化地历史地全面地看世界想问题的思路与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研究理念有许多共性,或许不失是一块“攻玉之石”。

全球化的到来使人之间的交往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得更加便利,然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往中的心理障碍、冲突和误解并不是现代化工具所能消除的。美国9·11事件后,世界各国似乎更加意识到研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交际的重要性。各研究派别也都从各自的角度研究、分析9·11事件与文化交际的联系。这也使中国业已红火的国际文化交际的研究与教育陡然升温。近几年,中国的入世、申奥的成功、大学外语教育改革浪潮的蓬勃兴起等使得跨文化交际学从学术研究领域走入高校教育和外语教学,其内容既涉及语言和思维又包含非语言交际方面的知识。国际国内形势正在表明在中国高校大力推广国际文化交际研究和教育方法已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 Elsenstein M (ed). The dynamic interlanguage[A]. Empirical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variation[C].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9.
- [2] Hall E T. Hidden Difference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M]. Hamburg: Guener & Jahr 1985.
- [3] Harper R G.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he state of the art[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8.
- [4] 胡文仲. 文化与交际[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 [5] Jahoda G. Theoretical and Systematic Approache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A]. In Triandis H C (ed)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volume 1[C].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 1980.
- [6] Jià Y. The stud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M]. China: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al Press 1997.
- [7] Kolb David A.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84.
- [8] Manin J N and Nakayama T K.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s (Third edition)[M]. London: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 2004.
- [9] Munich J R. Intercultural learning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DB/OL]. <http://www.Knowledgeboard.com/cgi-bin/item.cgi?id=117267&d=Print> Accessed 8 May 2004.
- [10] Naroll R and Michik G L and Naroll F. Hopcultural research methods[A]. In Triandis H C (ed).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volume 6[C].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1980.
- [11] Pease, A. Body language[M]. London: Sheldon Press 1981.
- [12] Tomalin B and Stempleski S. Cultural awareness[M]. Oxford: OUP , 1993.

(责任编辑 如月)

· 学术信息 ·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

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李爱华教授在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1期的《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一文中认为,国家利益问题的分析是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点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者,是以统治阶级利益为核心的全民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多种利益的聚合体,是以地域民族性为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利益形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家利益并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旁)